

科学史家许良英



- ① 初中毕业时的许良英(浙江临海海门,1935年夏)
- ② 1957年4月许良英全家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外合影(大气物理学家顾震潮摄影)
- ③ 1978年3月17日的许良英
- ④ 1987年9月3日许良英在来华访问的美国物理学家派斯(A. Pais)报告会上
- ⑤ 1987年9月16日许良英(前排右4)与参加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的部分与会者合影(中央党校)
- ⑥ 1996年9月6日许良英在北京接受美国物理学史家贝达什(L. Badash)赠送的爱因斯坦T恤衫
- ⑦ 1987年许良英(左)与80寿诞的导师王淦昌合影
- ⑧ 1992年7月5日祝贺于光远77岁生日聚会(右起:孙焕林、梁存秀、胡文耕、傅榛和、龚育之、于光远、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



(本版照片由熊卫民副研究员和王作跃教授提供)

科学史家许良英

王作跃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 普莫娜分校历史系, 美国)

胡大年

(纽约州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 美国)

摘要 许良英(1920 ~ 2013 年)是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著述在中国的主要编译者和传播者,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浙江临海,194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浙江大学及杭州市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为中共杭州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 年杭州解放后,进入中共杭州市工委负责青年工作,直至 1952 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院部,负责编辑《科学通报》。1956 年,转调哲学研究所,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 年被开除公职,被迫离京回浙江老家务农。在以后异常艰难的 20 年间,主持完成了 3 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翻译编辑工作。1978 年,重返科学院,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直至 1987 年离休。许良英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爱因斯坦和近现代物理学史。他认为理性论在爱因斯坦科学和哲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强调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驱动力。

关键词 科学史家 许良英 传记

中图分类号 N092:K8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441(2014)01-0049-13

1 少年岁月:从抗日救亡到爱因斯坦

许良英(图 1)于 1920 年 5 月 3 日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浙江省临海县(今临海市)括苍山山麓的张家渡村(2002 年改名括苍镇)。临海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台州治所,而台州是明代大学者和重臣方孝孺(1357 ~ 1402 年)的故乡。在燕王朱棣推翻惠帝朱允炆后,方孝孺

收稿日期: 2013-12-06; **修回日期:** 2014-01-20

作者简介: 王作跃,1963 年生,河南武陟人,博士,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物理学史、美国科技史、美国科技政策、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中美科技交流史研究,1982 ~ 1985 年师从许良英和赵中立等攻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思想史硕士学位;胡大年,1962 年生,江西南昌人,博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 20 世纪中国物理学史和中外比较科学史研究,1987 ~ 1989 年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许良英和董光璧攻读硕士学位(肄业)。

* 本文所引许良英文章,大多可在 <http://xu-liangying.hxwk.org> 和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303182775_9_1.html 阅读、下载。

宁被“灭十族”而不屈的事迹,令许良英铭记于心。许良英一生热爱自己的故乡,常提到家乡的美丽和方孝孺所代表的台州人的“硬骨头”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用清初文人陆陇其的话“人不可有傲态,不可无傲骨”来概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3]①}

许良英的父亲许则恭是一个兼作木炭生意的小地主,在他4岁时就去世了,留下子女5人,由他母亲卢文香抚养。许良英行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②([3],14、102页;[4])许良英从小喜爱读书,1925年开始就读于本村简陋的立本小学,自三年级始,常在课外阅读上海出版的《小朋友》周刊和《水浒》等章回小说。1927年,在临海读初中的大哥许良其见有高级同学被国民政府当作共产党逮捕,寒假回家时告诉了许良英,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共产党”3个字,并产生同情。1928年,他参加了学校举行的抗议日军在济南枪杀中国军民的活动。1929年,家乡因旱灾发生动乱,小学五年级的许良英因此转学到海门(今椒江)慈幼院,该院条件较好,有图书馆。([1];[3],37页)

许良英珍惜继续升学的机会,功课一直很好。受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强烈刺激(“害怕做亡国奴”),许良英开始每天看报,关心时事,并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少年许良英曾憧憬成为像爱迪生和法拉第那样的发明家。初二时第一次得知爱因斯坦的成就(当时尚未学物理课),即开始景仰他,此后一直钟爱物理。^{[4]③}1935年初中毕业(封三①)后,因经济困难,母亲想让他上免费的师范。他却因崇拜爱迪生一心想学工,并说服了母亲同意他入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就学。该校由国立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代办,就设在浙大校园内,简称“浙大高工”,其教师几乎全是浙大教授兼任,条件很好,二年级起电机课已使用相应的美国大学英文教材。^[5]1937年5月,许良英在杭州聆听了来华访问的丹麦物理学大师玻尔(Niels Bohr)的核物理演讲,并第一次见到了浙大物理教授王淦昌。^[6]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浙大高工随浙大内迁,但不久即被省教育厅解散。12月许良英被迫辍学回家,一边学习电报技术,宣传抗战,一边开始与兄弟们把家里的一座小楼改成书屋。在这挂着法拉第、爱迪生、爱因斯坦画像的屋中,他们一起读书自学。([3],16~18页)1938年3月,他有机会借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丛书第二集,其中关于现代物理学(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通俗读物,令其着迷,于是立志要终生在奇妙的物理世界中探索。此外,许良英还精读了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一书,并深受影响:



图1 晚年的许良英先生

① 许从平:《思念无尽——忆三叔许良英》(初稿)。

② 关于许良英的身世及其在1958年以前经历的最全面的介绍,见他的自传《回顾与反思》手稿(感谢许平惠允阅读)。

③ 《许良英:从职业革命家到科学史家》,《大师》,第60期,http://news.qq.com/zl2011/master/master_60.htm。

这本书是一年前买来的,当时看不懂,现在逐字逐句地慢慢咀嚼,慢慢消化。书中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类事物的精辟论述,使我深受启迪,使我第一次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4], 200 页)

与此同时,他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产生好感([4], 200 页)。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年,我是认认真真地读了书的,是我走上新人生道路的起点”([3], 17 页)。

2 大学时代:从迷恋物理到倾心革命

1938 年秋,许良英怀着对物理学的满腔热情和要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4], 200 页)的雄心壮志,以同等学力考入了浙大物理系。等他于 1939 年 2 月 8 日报到时,学校已经由浙江杭州迁至广西宜山,并经常遭受日军的空袭。入学不久,有一次为躲空袭,他和王淦昌来到同一个岩洞里,王发现他在读英文物理学著作,便与他交谈并给予鼓励。此后,许良英经常参加由物理系教授王淦昌和束星北主持的物理学前沿研讨会,从中他不仅及时了解了物理学上的新发现(如核裂变),而且亲身感受到王、束二人追求真理的真诚和竺可桢校长为浙大所定校训“求是”的精神。效仿教授们的研讨会,许良英和几个物理系、电机系的同学也组织了自己的读书报告会。([5], 209~211 页)

1940 年 1 月,浙大在第 5 次搬迁后抵达贵州遵义,并开始实行导师制。升入二年级的许良英选王淦昌作他的导师,从此二人接触更多了(封三⑦)。在遵义,许良英目睹了当地民众的赤贫和被抓壮丁的惨况,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暴戾“深恶痛绝”。严酷的现实唤起了许良英的革命激情,“于是义无反顾地走出物理理论的世外桃源,把主要精力用于阅读革命的历史和理论书籍”([5], 211 页)。1940 年 7 月 7 日,他在给兄弟们的家信中写道,“现在社会意识灌入了我”。同年 11 月 5 日,他又在信里提到,自己“一个半月内已看的只有《现代唯物论》、《辩证法的自然科学观》、《中国的再生》”,并说兴趣已“从私生活解放到人类的同情”^①。1941 年 1 月的皖南事变,更坚定了他要作一个职业革命者的决心,因此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在 1941 年 1 月 30 日的家信里,他说:

[自己]已抓住时代的主潮,虽然我没有乘长风破万里浪的魄力,可是我已学会了海啸,将唤醒醉梦中的人们;磨炼我粗野的蛮性,准备为人类解放的战斗而效命。^②

许良英主张学习哲学,“积极地健全进步的理论体系,助长新兴的革命力量”^③。在遵义期间,他把课余时间几乎都用来阅读马列著作和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书籍。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许良英下定决心:“既要革命,就不能怕死”,遂参加了浙大进步学生团体“黑白文艺社”。1941 年暑假,许良英又随浙大理学院从遵义东迁 75 公里,在湄潭县城读完三、四年级。^④ ([6], 213 页)三年级时他选修了“社会学”,从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许良英为此课撰写了一篇两万五千字的论文,题为《基于社会发展史的中国科学史

① 两封信引自:许从平《思念无尽——忆三叔许良英》(初稿)。

② 许良英:《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习作小集》,未出版手稿,感谢许平惠赠。

③ 许良英:《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习作小集》,未出版手稿。

④ 许良英:《回顾与反思》,手稿,第 58~59 页;许从平:《思念无尽——忆三叔许良英》(初稿)。

纲》，得到教授的好评。^[7]这可能是许良英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

尽管革命成了许良英关注的重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物理学的学习，而是试图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还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在改作物理实验室的小庙的门上写下“科学至上、物理第一”的对联，以对抗蒋介石的“国家至上、军事第一”口号。（[6]，212页）在1941年10月9日的家信中，他写道，“凡是于人类有益的学问我都想学习，然而我决不自私，把学问当作装饰品以自娱”或成为“专家”、“学者”的基石。^①1942年4月，他作《试论感情与理智》一文，在进步同学中传阅，提出“感情与理智在最根本、最崇高的领域中是同一的，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革命家、严正的科学家和纯正的宗教家三者的灵魂在某个方面是同一的”，这种感情与理智的统一性就是他一生推崇的理性。^②爱因斯坦对自然界统一性的信仰可能影响了许良英的思想。许良英的新追求也体现在他的社会活动中。1941年春，许良英发起组织了一个新的进步学生社团“质与能自然科学社”，该社成立之初即请束星北演讲“物质与能量”，并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的学术讨论会，其结论认为，中国长期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阻碍了科学发展。^③

1942年春，许良英随导师王淦昌作毕业论文，研究核物理中“ β 衰变与中微子存在”问题。因许良英当时已无心从事物理研究，只求早日毕业离校，以便寻找中共党组织到敌后打游击，所以最后只是对 β 衰变作了文献分析，并未顾及中微子存在这个王淦昌认为能够得诺贝尔奖的题目。（[6]，213~214页）其1942年4月3日的家信，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

“研究生”、“出洋”这类梦想三四年前也作过的，但近两年来已没有想过一次了。专门研究物理不是这个时候呀……我已感到有比弄物理更有意义一万倍，更艰巨一千万倍的任务落在我的两肩上。我不能无视伟大崇高的事业而自私地往牛角尖里钻。（[3]，34页）

尽管如此，王淦昌仍然十分赏识许良英，认为许良英做学问诚实、理解力强并富有创造性，因此邀请许良英留校做助教与他一起研究中微子问题。但许良英决心已定，故婉言谢绝了老师的盛情，在提交论文的第二天就离开了湄潭，到桂林找一个他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初中同学，想一起回到浙东老家打游击抗日。见面后才得知，这位同学虽已入党但却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许良英只好留在桂林，到中学教书并参与《科学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1944年9月，桂柳会战爆发，11月日寇攻占桂林，许良英因而被迫到桂黔边境山区的榕江流浪了3个月，其间收到王淦昌的来信，遂应邀于1945年2月回到浙大物理系任助教。（[6]，214~216页）

在1945~1949年担任浙大物理系助教期间，许良英的主要精力仍用于地下革命活动。这期间他参与组织了“科学时代社”，一个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进步青年科学工作者所组成的全国性组织，出版《科学时代》杂志。1945年他集合了其他浙大社员的意见，撰写了《我们对〈科学时代〉的希望》一文，提出“科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人民大

① 许良英：《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习作小集》，未出版手稿。

② 许从平：《思念无尽——忆三叔许良英》（初稿）。

③ 许从平：《思念无尽——忆三叔许良英》（初稿）；许良英：《回顾与反思》，手稿，第69~70页。

众的科学”,发表在1946年第3期上,成为该杂志的出版宗旨^[8]。1946年夏,浙大复校迁回杭州,许良英趁机绕道重庆,在《新华日报》社办理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手续。回到杭州后,许良英协助建立了浙大第一个党支部,并于1947年8月出任支部书记。1947年10月26日,进步学生、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三天后被害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引起浙大校长竺可桢和全校师生的抗议。在许良英等人的组织领导下,这场抗议活动演变成全国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学生运动。一年后,许良英以化名在浙大发表纪念文章,称“于子三运动”表明,“浙大,这面曾被誉称为东方剑桥的辉煌的旗帜,飘扬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最前线”。1947年12月,中共杭州市工作委员会成立,许良英任委员,分管全市中学和部分大学的地下党工作。^[9]

1949年5月3日是许良英的生日,当天解放军进驻杭州。第二天他参与组织了全市7千大、中学生的集会,以纪念“五四”和庆祝解放,并在他起草的《告全市同学书》中将“五四”运动定性为“反帝、反封建运动”。多年后,他对此反思,认为当时没有意识到“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民主和科学,而且忘掉了早年对自己影响深刻的爱因斯坦的民主思想。([4],205页)半个月后,许良英被调任中共杭州市委青年委员会,负责全市大学和中学的党务工作。后改任杭州市团委学生部部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据理力争保护了束星北^[10]。1950年他与浙大史地系毕业生、原地下党的战友王来棣结婚。同年,长子许成钢出生(次子许平1954年生于北京)。^①1951年夏,浙江省委曾推荐许良英第一批赴苏留学,攻读核物理,但因为错过截止日期而未能成行。^②

3 中国科学院的政治漩涡:从《科学通报》到哲学研究所

1952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人民日报》指责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并犯有政治错误。时任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随后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调许良英进京,于1952年6月就职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全院出版物的政治把关,并具体领导《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来京后,许良英推荐了一批原浙大地下党员到科学院工作,其中包括王来棣(任职近代史所)、范岱年、吴洵高和任知恕等。不久,许良英请吴洵高接替他书报检查的工作,自己则专注于编辑《科学通报》和全院的对外宣传。1954年,中科院效仿苏联科学院成立了学术秘书处,许良英随《科学通报》并入,担任学术秘书处党支部书记,并列席院常务会议和党组会议。([4],206~207页)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许良英在《科学通报》上以笔名“林因”发表悼念文章^[11],称爱氏为“现代物理学的奠基者,当代伟大的科学家和卓越的和平战士”。

在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许良英被停职审查一年,原因是在杭州时他曾介绍方然(1919~1966年)入党,方时任杭州安徽中学校长,后来被认定是胡风集团的“骨干”。许良英后来回忆道:

① 许良英:《回顾与反思》,手稿,第244~245页;《纪念回访:许良英夫妇访谈录》(上集),<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shengminghuiyinbi/x-02072013151548.html>。

② 许良英:《回顾与反思》,手稿,第281页。

这是我一生受到的第一次政治打击,虽然审查结果认为我历史完全清白,所交代的一切全部属实,但我下决心不再从事行政性工作,而应投身于学术研究。([4], 207页)

为此许良英请求调到1955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哲学所”),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在哲学所成立一个研究组开展此项研究,是他在1954年的一次院务会议上建议的,后来(也是根据许良英的提名)由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在哲学所负责筹建。1956年,国家制定12年(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被列入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内。1956年3月,尽管当时对许良英的审查尚未正式结束,于光远仍邀请了许良英参与该领域研究规划的制订工作。在制订规划时,于光远提出将该学科领域的名称,按照恩格斯一部相关著作的题名,由“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改为“自然辩证法”。许良英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后者有明显的倾向性,不利于研究工作的自由开展。最后争论的双方达成妥协,以“自然辩证法”为主,“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为辅放在括号里。([4], 207~208页)

《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于1956年10月发表在《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通讯》的创刊号上。原规划草案只有8类题目,在于光远的支持下,许良英在规划发表之前又临时增加了第九类,即“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自然科学同生产、技术、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宗教等的关系,自然科学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这样就使“自然辩证法”超越了哲学的范畴,使它具有了类似后来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趋向。许良英所增订的第九类题目反映了他自己的研究兴趣,其源头则是他1938年所精读的爱因斯坦的著作《我的世界观》。该创刊号还刊登了许良英撰写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一般性的问题和物理学方面的问题)》^[12]一文。^[13]

在被停职审查期间,许良英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专著。在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的支持下,应人民出版社之约,许良英著《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其中,许良英还邀请他的同事范岱年撰写了一章,介绍十二年科技规划。范也毕业于浙大物理系(晚6年),因受许良英影响而参加革命。1956年5月,许良英仍在等待正式批准他调往哲学所。其间,他看到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报告,为苏联整肃的残酷而震惊。紧接着,他又于5月26日听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报告中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促进发展文艺和科学的方针,使许良英受到极大鼓舞。这两方面的刺激,促使许良英在书中加入了一章,专门论述百家争鸣方针的必要性,提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只要不是反革命,都应该有宪法上规定的各种自由权”,倡导“解决思想上的矛盾,只能用说理、批评和教育,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4], 208~209页; [14])

1956年6月28日,许良英到哲学所报到,第二天就去中宣部开会,会上于光远宣布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正式成立,于光远兼任组长,许良英为创始成员之一(同事中有赵中立和兼职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教师何成钧)。在哲学所,许良英参与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号,并在其1946年初译稿的基础上,重译了美国物理学家与科学哲学家林

赛(R. B. Lindsay)和马根脑(H. Margenau)合著的关于理论物理学与哲学的专著《物理学的基础》。1957年初,在整风运动中,许良英听了毛泽东一系列讲话的传达。讲话宣传双百方针,号召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许良英对此非常赞同。至1957年5月,“整风鸣放”运动掀起高潮。许良英因笃信毛泽东和党中央,自己并无任何“鸣放”言论,但他通过读报和到北大看大字报一直密切关注着各种批评意见,并欢迎原来科学院院部的同事对自己的批评。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运动已由整风转为反右,随后很多在鸣放中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许良英认为,这种态度的突然转变,会使党失信于民。他还以为“反右”是那些反对鸣放的领导干部背着毛泽东干的。所以他在哲学所6月13日和6月14日两次党员骨干会议上都是第一个发言,反对“反右”并为受批判的民主人士辩护。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反右”的确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但这为时已晚。由于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许良英自己沦为科学院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右派。7月29日和8月³日,《人民日报》两次刊登哲学所批判许的报道。8月1日,科学院借用北大礼堂召开对许良英的全院批判大会。许良英在科学院的同事赵中立、范岱年等都受到牵连,被划为右派。1958年3月1日,哲学所宣布处分决定:许良英被认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送黑龙江监督劳动。许良英因腰部关节炎,怕经受不了东北的严寒,被迫“选择”了“自谋生路”,即放弃公职!妻子王来棣,因丈夫突然被打成右派而伤心过度,致怀孕已十月的胎儿流产,既而又因继续收留右派丈夫、不愿与他划清界限而被单位给予开除党籍和行政降级的处分。为了不再继续连累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封三^②),许良英决定回浙江老家务农,以后又办理了离婚手续。^①([4],210~213页)

4 逆境中的奋争:从公社社员到爱因斯坦学者

1958年6月8日,许良英离开北京回到故乡张家渡村务农。1961年3月,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在回京看望妻儿期间,他曾与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郁文面谈,得知将考虑让他回院工作,但因经济困难全国都在精简下放干部,许良英只能先回农村等待。1962年,哲学所为配合当时中苏论战等政治需要,计划编译大量世界著名科学家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言论集。应于光远的邀请,许良英在家乡参与了这项工程,并负责编译《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下简称《爱选》)。哲学所并安排商务印书馆出版许良英的译作《物理学的基础》(1964年),使其可以用所得稿费从生产队购买工分,以换取口粮。随后许良英到北京工作了4个月,“查阅了所能找到的爱因斯坦[的]全部论著,拟定了选题计划,并于1963年3月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正式约稿合同”([15],63页)。两个月后,他用扁担将几十本爱因斯坦著作和传记挑回了张家渡,随即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阅读和日以继夜的翻译:

^① 关于许良英在中科院早期的经历,参见:《许良英先生访谈录》(访谈人为樊洪业、王德禄和尉红宁),《院史资料与研究》,1996年第2期,第17~36页;许从平:《思念无尽——忆三叔许良英》,初稿。

我日夜埋头于书稿之间,一天工作14小时以上,每夜点着油灯工作到12:30以后,没有休息日,连春节也顾不上。([15],63页)

其间,上海市科委秘书李宝恒应许良英之邀,分担了一小部分的翻译工作。到1964年10月,两人已按原计划完成了《爱选》的译稿,共选译了200多篇文章(其中许良英翻译了181篇),50多万字,包括了爱氏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然而,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又大多被派往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原来的出版计划因此被搁置了,商务印书馆遂将译稿退还给许良英。面对挫折,许良英并未放弃。他不仅将全部译稿又校对了一次,而且还加写了一篇9万字的《编译后记》,并以其为基础,完成了一部17万字的书稿《爱因斯坦的世界观》^①。([15],63页)

为了试探外界的反应,许良英将《编译后记》和《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二稿中论述哲学思想部分的要点提炼成文,题名“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16]。该文经李宝恒略加修改(主要是结束语),联名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年第4期上(作为摘帽右派,许良英不得署真名,故用笔名“林因”)。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以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作了较深入的剖析和批判。限于作者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该文在内容和观点上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尽管如此,许良英对于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特点的分析,特别是关于斯宾诺莎和马赫对爱因斯坦的影响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合理的,并有自己的特色。该文明确指出,爱因斯坦的“主导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已经不仅是自发的,而是具有很大的自觉性了”;“爱因斯坦的唯物主义倾向、唯理论[理性论]、决定论思想,以至人生观、宗教观等等,都可追溯到斯宾诺莎”;爱因斯坦不是一名马赫主义者。此文发表后,曾受到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好评。([16],64页)

1965年底,许良英只用了两个月就译完了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科学哲学家弗兰克(P. Frank)的《科学的哲学》,然而因“文革”爆发,该译著已排好的版被拆,直到1985年才得以出版^[17]。1966年1月16日,他读到《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哲学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滚一身泥巴”,觉得自己虽身在农村,却脱离群众,日夜钻在书稿之间,“实在很危险”,所以立即恢复以田间劳动为主的生活,只是在晚上继续翻译工作,至1966年6月又译完弗兰克的论文集《现代科学及其哲学》(未出版)。([4],214~215页;[17],“译者前言”,1页)

1966年夏,“文革”开始不久,许良英就成了村里的主要打击目标,但最初受到了“四清”工作队的保护。1968年夏,他被押送到杭州,在浙大关押了近一年,审查其所谓的历史问题。1969年5月,浙大的审查结束,并未发现任何新问题。然而,当许良英回乡后,当地的革委会却执意要在8月底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他,并凭空诬陷他是“出卖过6个同志的大叛徒”。许良英不堪其辱,决心以死抗争,在批斗大会前夕毅然喝下敌敌畏农药,幸经及时抢救,12小时后才苏醒过来。([4],215页)

刚刚度过生死劫,许良英又必须为他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选的出版而抗争。1969年11

^① 书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后,不幸遗失。详见: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1972年10月3日,手稿。

月,中科院物理所的陈庆振来到临海向他“借阅”《爱选》的草稿及有关资料。许良英由此得知正在北京和上海开展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运动,以及他存于李宝恒处的《爱选》译稿已被上海革委会写作组“借用”。1971年10月,许良英得知商务印书馆已恢复出版业务,便去函询问《爱选》的出版问题,得到答复:“立即寄去成稿,以便决定”。许良英随即开始向上海方面索还译稿,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在翌年3月底拿回《爱选》原译稿。4月7日,商务即决定“尽速出版”。在以后的数月间,许良英又发现了一些新出版的爱因斯坦文献,他与李宝恒合作,分头补译新资料,并复核原译稿。就在他们预计交稿之前两、三周,许良英意外地从一份图书征订目录中发现,上海方面竟然以“复旦大学《爱因斯坦言论集》编译组”的名义,欲抢先出版他们以“借阅”名义窃得的许、李二人的《爱选》原译稿。许良英冒险亲自到上海,同市革委会写作组的头头朱永嘉交涉,但未果。许良英又写信直接向周恩来总理申诉,终于迫使上海方面妥协:上海的书改为内部发行,商务则按原计划公开出版。此后,许良英决定扩大译稿内容,将原来的一卷扩充为三卷,内容不仅包括爱氏的哲学著作,而且大量增加了他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言论,赵中立、范岱年和张宣三也由此受邀参与合作。^① ([15], 538 ~ 539 页)

1973年11月,商务印书馆让许良英来馆,以临时工身份从事编译后来定名为《爱因斯坦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工作。第1卷于1974年9月交稿。在京期间,他目睹了江青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终于促使他摒弃了多年来对毛泽东及其错误政策的迷信。11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上台的商务印书馆新领导,将许良英骗回浙江老家后即停发了其生活费。化名“王京”参与核武器研制任务的王淦昌,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主动承担了许良英好几个月的生活费,直至商务印书馆恢复给许良英发放生活费。1975年9月,第2卷交稿。10月,许良英为第3卷的出版事宜再次赴京,其间他继续争取返回哲学所工作,又因赶上“批邓”运动而未果。11月,他获商务印书馆通知,可留京继续编译第3卷。1976年10月,许良英喜获“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却又因受风寒而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被迫住院数月,许多老朋友都以为他将不久于人世,纷纷前来探望,可他却“泰然处之”。《文集》的第1卷于1977年1月开始发行,首印25000册,“不到半年即告售罄”。10个月,第2卷出书;第3卷于1980年3月出书。3卷《文集》共有410篇译文,135万字,是当时世界上“内容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对中国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集》受到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赞许和推荐,并为广大学生和年轻人所喜爱。([4], 216 ~ 222 页; [15], 540 ~ 547 页; [18])

5 改革开放的年代:从科学思想史到科学与社会研究

1978年4月,许良英终于获准返回中国科学院工作(封三^③),6月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新成立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就职,研究近现代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尤其是在《文集》的基础上推动了爱因斯坦研究,并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在科学史教学和研究中,许良

^① 许良英:《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1972年10月3日,手稿。

英强调科学基础训练、严谨的学风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敢于挑战权威,以中国古代正直历史学家为榜样,“刚正不阿、秉笔直书、彰善箴恶”。他认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尽可能摆脱个人、集团、民族、阶级的偏见,对历史上的人和事给以客观的历史评价”^[19,20]。他提出:

科学史研究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站得高,看得远,眼界广,对整个人类历史和科学史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要接受一切对人类有益的思想资源,不限于一家一派的思想。^[21]

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与学生(图2、3)平等讨论学术问题,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22]例如,在《〈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1988年)一文中,他反思了自己当年在爱因斯坦研究上的两个错误—否定宇宙学和批判爱因斯坦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评论。他认为,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是由于迷信斯大林等政治权威和教条理论所造成的,指出“迷信是真理的大敌,必须用科学和民主来破除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23,24]。



图2 1986年5月28日许良英(左1)与他的研究生仲维光(左2)、王作跃(左3)、陈恒六(左4)、刘兵(左5)在许良英寓所举办物理学史讨论班



图3 2010年8月2日学生们到许良英(前排左)寓所向其祝贺90大寿(前排右:师母王来棣;后排左起:胡大年、王作跃、陈恒六、刘兵)

在科学史所,许良英继续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早在1977年3月,许即已首先向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提议,举办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的活动,为爱氏公开平反。为此,中国物理学会于1978年秋正式上报中央,并迅即获得批准。1979年2月20日,一千多名中国科学家云集北京,庆祝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许良英起草了该演讲稿。^[18,25]1983年11月,他在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讨论会”上宣读论文《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26],提出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是“唯理论的实在论”,这不仅在晚年表现明显(如其他物理学史家所言),而且在早年的物理学研究中就已占居主导地位。他还和他的硕士研究生屈傲诚率先发表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历史研究,影响广泛。^[27]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邀请专家为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举办系列科技知识讲座,第一讲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由钱三强主讲,讲稿由许良英和生物学史家李佩珊



图4 1980年1月23日《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编写成员在友谊宾馆合影(前排右1为许良英)

(时任科学史所副所长兼近现代研究室主任) 主笔撰写,其中许良英着重强调了科学与民主的重要性,明确提出“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28]。与此同时,许良英(与李佩珊等合作)还主持编写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图4),该书“题为简史,实是大书”([29],35页),其初版于1985年6月问世,受到广泛好评并获奖,仅仅数月即告售罄。1999年,该书又增订再版^[24],其篇幅增加了三分之一,达126万字。([4],222~223页;[29],34~39页;[30],第2版序)所有这些工作,都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科技史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

在其晚年的学术研究中,许良英一直密切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1981年,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当年第1期上发表著名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深入阐述了科学与民主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指出“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1986年,他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访谈,提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治这些概念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其观点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的反响。后来他又以敏锐的目光和对改革开放的高度责任感,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文章。他还身体力行,参与组织了一系列旨在推动中国科学与民主发展的活动,包括呼吁民主化、增加科学和教育投资、以及呼吁宽容以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两封公开信等。^[31]1993年,他在《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要真正实现民主,首先必须经历一个思想启蒙阶段,……。这种启蒙,首先要启知识分子自己的蒙”。为此,晚年的许良英与老伴王来棣(他们于1979年复婚),不顾年老多病并排除了诸多干扰,在查阅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合作撰写了专著《民主的历史》^①。^[32]

许良英一生为人正直,学术严谨。秉承他所尊敬的竺可桢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多年来,他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坚持倡导和从事科学史的研究,推动中国的科学和民主的发展,其不懈努力赢得了国内外知识界的广泛敬重。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萨哈罗夫奖”。2010年,在庆祝许良英90寿辰之际,其好友、国际著名物理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Gerald Holton)曾如此评价许良英:“像他这样的人,实属罕见:他既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又是一个充满勇气的公民,更是一个堪称为典范的人(He is that rare combination of a fine scholar, a courageous citizen, and an exemplary human being)。”([22],134页)

① 许良英、王来棣:《民主的历史》,手稿。

2013年1月28日,许良英在北京因病辞世,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悼念。历史将铭记这位爱因斯坦思想在中国的主要译介者和传播者、中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史家和中国科学与民主事业的坚定推动者。

致谢 感谢范岱年、许成钢、许平、陈罕立、张柏春、熊卫民和《中国科技史杂志》审稿人和编辑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帮助。

参 考 文 献

- 1 许良英.关于立本小学回忆点滴[A].傅国涌(编).过去的小学[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 2 许良英.痛悼恩师陈立先生[A].陈立先生纪念文集[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 3 许从平.肩住黑暗的闸门:我的三叔许良英[M].香港:明镜出版社,2010.
- 4 许良英.幻想·挫折·反思·探索——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A].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第三部[M].下册.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
- 5 许良英.回忆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A].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 6 许良英.恩师王淦昌先生对我的启迪和爱护[A].胡济民,等(编).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208~209.
- 7 许良英.痛悼恩师王淦昌先生[A].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C].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371~372.
- 8 黄宗甄.科学时代社和《科学时代》[J].中国科技史料,1996,17(4).
- 9 许良英.两篇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旧稿和两点补充回忆——纪念于子三运动40周年[A].李景先,田万钟,吴海高(编).于子三运动:于子三烈士殉难四十周年纪念文集[C].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193.
- 10 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N].科学时报,2005-12-23: B3.
- 11 林因(许良英).伟大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J].科学通报,1955,(5).
- 12 许良英.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一般性的问题和物理学方面的问题)[J].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通讯,1956-10,(创刊号).
- 13 许良英.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三十年的风风雨雨[A].1986.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C].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122~131.
- 14 许良英,范岱年.科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15 许良英.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经历——《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J].科学文化评论,2007,(6).
- 16 李宝恒,林因(许良英).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5,(4):32~46.
- 17 (美)弗兰克.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M].许良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
- 18 刘兵.许良英与《爱因斯坦文集》的命运[N].中国新闻周刊,2013-02-17.
- 19 许良英.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刍议[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3).
- 20 许良英.历史理性论的科学史观刍议[A].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C].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 21 许良英.科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思考[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4,(3).
- 22 王作跃,刘兵,陈恒六(编).呼唤民主与人权:贺许良英先生九十寿辰[C].香港:明镜出版社,2012.
- 23 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N].科技日报,1988-08-28.
- 24 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A].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C].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182~185.
- 25 胡大年.爱因斯坦在中国[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212~216.
- 26 许良英.爱因斯坦的唯理论思想和现代科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2).

- 27 屈傲诚,许良英.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查[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6);1985,(1).
- 28 钱三强(主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10.
- 29 金克木.倒读历史[J].读书,2009,(9):35.
- 30 李佩珊,许良英(主编).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M].第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 31 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C].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
- 32 许良英.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A].许良英.科学·民主·理性:许良英文集(1977—1999)[C].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254~257.

Historian of Science Xu Liangying: A Short Biography

WANG Zuoyue,

(Department of History,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Pomona, USA)

HU Dani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ity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Abstract Xu Liangying (1920 ~ 2013) was an eminent historian of science, a leading translator and exponent of Albert Einstein's works in China, and a founder of the Chinese study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Born in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Xu graduated from the physics departm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n 1942, where he studied with the nuclear physicist Wang Ganchang. Xu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1946 and became one of the leaders of student movement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in Hangzhou, Zhejiang, during the 1940s,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developing the CPC organizations in Hangzhou. After the CPC took over Hangzhou in 1949, Xu was a member of the CPC Hangzhou Municipal Working Committee and took charge of youth affairs. In 1952, he was summoned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in Beijing, editing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In 1956 Xu requested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where he suffered political persecution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in 1957.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was forced to return to his native rural home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working as a peasant. During the next two decades, Xu led the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of the three-volume *Collected Works of Albert Einstein*. In 1978, Xu returned to the CAS where he served as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87. Xu's main research concentrated on Albert Einstein and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ysics. He proposed that rationalism was a dominant influence in Einstein's scientific ideas and insisted that science and democracy were leading driving forces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historian of science, Xu Liangying, biography